

•CHONG QING KANG ZHAN CONG SHU•

抗战时期 重庆的对外交往

重庆抗战丛书

胡绳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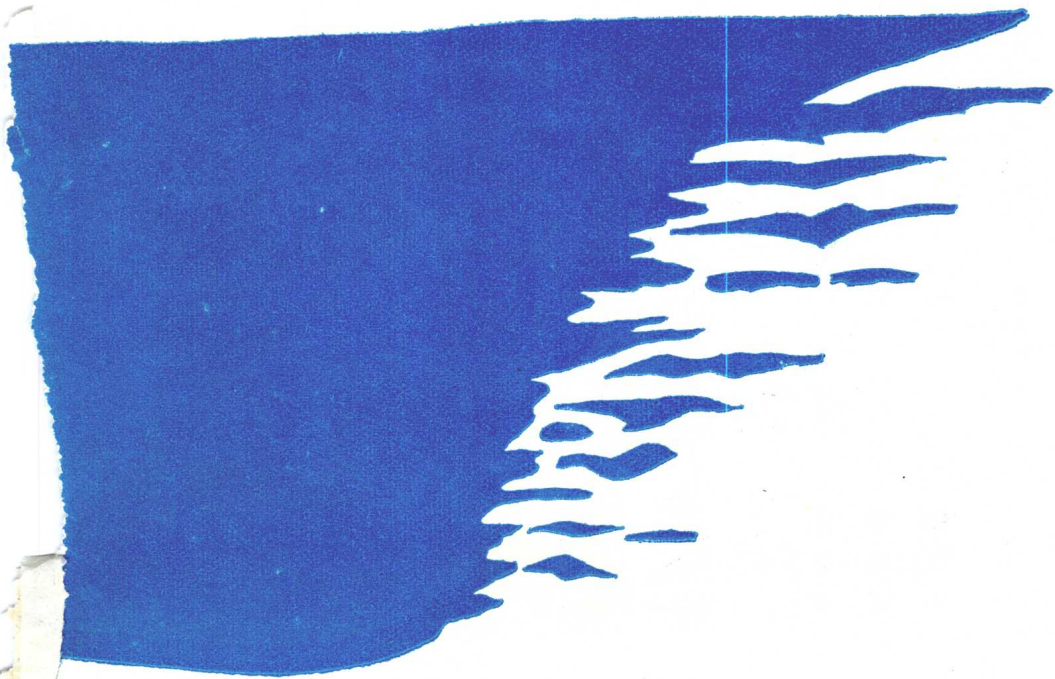


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 编
重庆出版社

抗战时期重庆的对外交往

重庆抗战丛书

胡绳署



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 编
重 庆 出 版 社

(川)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黄长军
封面设计 徐赞兴
技术设计 费晓瑜

苏光文 主编
抗战时期重庆的对外交往
(重庆抗战丛书)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125插页4字数246千
1995年8月第一版 1995年8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

ISBN 7-5366-3125-1/D·135

定价: 13.60元

出版说明

一、为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和振兴重庆服务，特编纂出版《重庆抗战丛书》（下简称《丛书》）。

二、《丛书》属学术性著作。它立足陪都重庆史实，联系全国抗战形势，对重庆抗战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系统、深层次的研究，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可读性为一体。既可供史学工作者特别是抗日战争史研究者参阅，又面向社会，供广大读者和海外有兴趣的人士阅读。

三、《丛书》包括重庆国民政府、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国民参政会、重庆人民对抗战的贡献、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军事、兵器工业、防空、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对外交往以及陪都人物、陪都遗址和大事记等16本专著。

四、《丛书》的年代断限，起于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止于1945年9月抗战胜利。某些内在联系十分紧密的史实，可适当将时限前展或后延。

五、《丛书》的开本为大32开，数字用法参照《关于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注释一律采用脚注。

六、《丛书》的编写出版，得到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政协重庆市委和重庆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学院、重庆社会科学院、重庆市地方志总编室、中共重庆市

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图书馆、红岩革命纪念馆、重庆日报社、西南兵工局、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重庆市历史学会等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参加本书的编写人员，主要是上述单位所属的教学、科研人员与专业干部。因此，本丛书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共襄盛举的成果。

序

《重庆抗战丛书》，是重庆市政协牵头编纂的一套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书。这项工作很有意义。据我所知，最近一个时间里，其他地区、单位也将有一批抗日战争的专著和资料出版。其中《丛书》并且不止一部。在抗日战争过去50周年之际，人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正在掀起一个热潮。

抗日战争所以需要研究，理由不止一端。最根本的原因是这段历史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我们只须稍微回顾一下过去，事情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历史常有巧合，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殖民地的黑暗深渊，不能自拔。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到1937年抗日战争，共42年。那中间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它们都没有给中国找到出路。1919年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又进行了17年，屡起屡仆。日本军国主义却在这个时间里占领了中国东北，制造出伪“满洲国”，并进而分裂华北。中国真正临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就是在这个严重形势下爆发的。八年抗战的过程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的过程。在那以后四个春秋，中国人民一举取得了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紧接着又跨越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关。时代接连不断地迅速改变面貌，令人目不暇接。现在我们已经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过了40多年。回顾甲午战争以

来100年的中国历史，我们发现八年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转折的一个关键。研究这段历史，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华民族遭受的深伤巨痛，累累血污，也看到了它的倔强挺立高大的灵魂；不仅看到了旧中国如何死死拖住历史前进的后腿不放，也看到了历史如何促使人们觉醒，加速把旧中国变为一个新中国。

重庆在抗日战争中政治环境独特。它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所在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相当一部分活动则是在重庆进行与展开的，其中包括毛泽东同蒋介石的会面和谈判。抗战期间，重庆本身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也有研究整理出来，供人了解的价值。谈论抗日战争，少不了要讲重庆的种种活动，就像少不了要讲延安的种种活动一样。历史给予了这两城市极大的光荣。《重庆抗战丛书》一系列研究专题和资料，涉及不少领域，具有特色。人们应该可以从中找到所需要的东西，去认识抗日战争特定的历史地位，以及它怎样为后来新中国的降临作了准备。

抗日战争把全国空前未有地动员起来了。许多地区，不分前线与后方，都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史实值得笔之于书。有了它们，就有了我们全民族这场惊天动地的、为生存而斗争的全貌。《重庆抗战丛书》带了一个好头。希望它是我们望到的地区命名的第一部大型历史书，不是这方面仅有的一部书。

刘大年

1993年5月4日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序····· 刘大年	1

上篇 政治外交

第一章 走抗战外交之路·····	1
第二章 抗战外交的“苦撑待变”·····	14
第三章 抗战外交上的“左右逢源”·····	30
第四章 以结盟求“共胜”的外交新战略·····	44
第五章 争取美英援助的不懈努力·····	58
第六章 风险迭起的大国之旅·····	73
第七章 开罗会议召开前后的远东国际关系·····	92
第八章 中美联盟中的国共关系·····	110
第九章 萦绕抗战胜利的外交风云·····	128

中篇 军事交往

第十章 中国战区统帅部的建立和中国远征军的组建	145
第十一章 中美英关于共同作战问题的国际协调	154
第十二章 中国远征军在滇缅路的英勇作战	171
第十三章 中国远征军全线大撤退	185
第十四章 中国远征军在缅北大反攻	197
第十五章 滇西反攻战的胜利和中国驻印军的回国	216

下篇 文化交往

第十六章 文化交往机构和传播媒介	235
第十七章 文学对外交往	247
第十八章 电影对外交往	262
第十九章 美术对外交往	275
第二十章 音乐对外交往	287
第二十一章 对外文化交往中的认同与排击	300

后记	314
----------	-----

上 篇

政治外交

中国近代的外交史，是一部对外妥协退让的屈辱历史。1921年华盛顿《九国公约》和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虽然都规定“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但它并未能约束列强对中国的贪婪和野心，也未能遏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蒋介石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奉行忍辱退让的外交政策，一再对外妥协，直至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才起而抵抗，中国抗战外交战略格局方始形成。

第一章 走抗战外交之路

中国走向抗战外交之路，坎坷曲折。其中，经历了由不抵抗到抵抗的演进过程。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为此作了种种努力，付出了重大代价。

一、国民政府初期的政治外交

1927年4月18日，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关键时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的政权性质，决定了其外交的总方针必然依附于帝国主义。

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初（1927.4—1931.9），为争取实现全国统一并获得国际承认，采取了亲帝国主义反苏的外交政策。1927年5月10日，国民政府在其成立后的第一次外交声明中宣布：对外“不采暴力手段”。^①11月5日，蒋介石在日本对田中义一首相表示：“中国军队的革命运动，包含着中国及列强的利益目的”，只要日本支持我“早日完成革命”，则“满、蒙问题也容易解决，排日运动会绝迹”。^②12月，蒋介石在上海的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发表演说，宣称：“外交方针也是要急速改定的，我们既然要对俄绝交，便必须与各国一致来反对第三国际。”^③1928年2月，外交部长黄郛代表国民政府发表的对外宣言也表示：若中国“他日统一成功，对于世界经济实现，负有调剂之重大使命。故吾人一方面极愿与各友邦以平等地位，互相提携，完成此调剂世界经济之重任；而另一方面，不得不希望各友邦与以达到前项目的之赞助。”^④6月，国民政府在其《统一中国之事业正告完成》的对外宣言中，又声称：“其根本破坏现时社会之组织，若共产党等，亦必不容其存在，惟欲建设新国家，则国民政府对外之关系，自应另辟一新纪元。”^⑤

国民政府对外忍辱退让、依附帝国主义反苏反共的方针，充

① 程道德等著《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以下凡引该书只注书名和页码）。

②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第1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以下凡引该书只注书名和页码）。

③④⑤ 《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年）》第410、413、414页。

分表现于对这一时期一些重大事件的处理和交涉上。比如对“济南惨案”的处理。1928年5月初,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国民党部队北上,在济南肆意屠杀中国军民,甚至公然破坏外交惯例,火烧国民政府山东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杀害新任驻山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及其随员。面对日军的暴行,当时正在济南的蒋介石却训示部下“忍辱负重”,“对于日本人,绝对不开枪;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①并下令改道北伐。此后,中日双方在济案交涉过程中,国民政府不仅态度暧昧,而且在最后达成的协定中还承担了保护“日侨”的责任。协定把这一严重事件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不幸”,而把日军的暴行更说成是“中日两国所受之损害问题”,还“切望”“视此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以期两国邦交日臻敦厚。”^②

如果说,对“济南惨案”的处理反映了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外交政策的一面,那么,反苏反共则是这一外交政策的另一面。国民政府从它建立之日起,就推行反共政策。对内,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对外,追随帝国主义反对苏联。1927年12月,国民政府借口广州起义与苏联领事馆有关,竟不顾国际法原则,枪杀苏联副领事。同时,又宣布封闭苏联驻华各领事馆及商业机关,撤销对苏领事的承认。1929年5月27日,中国警察对哈尔滨苏联领事馆进行突然搜查。7月,中国当局武力夺取中东铁路,爆发中东路战争。这使得苏联政府于7月17日宣布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1928年至1931年,国民政府为了树立新政府“外交自主”的形象,搞了一个以“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为内容的“改订新约”运动。首先,于1928年7月25日与美国达成协议,签订《中

① 参见彭承福主编《中国革命史教程》,第153页,西南师大出版社。

② 《中华民国外交史料选编(1919—1931)》第443页。

美关税条约》，接着，又先后与挪、比、意、丹、葡、荷、英、瑞（典）、法、西、日等国缔结了新的关税条约或“友好通商条约”。这些条约，都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但海关总税务司是英国人，其他各重要海关的负责人也多为外国人，这就在实际上限制了中国关税的真正独立自主。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西、意、葡、丹、比等五国在与中国订立的新约中虽已取消了领事裁判权，但规定在“中国与签订华盛顿条约国议定取消领事裁判权之后”方能生效，且“应于各该国一律适用”。1929年4月，国民政府照会英法美等国要求废除领事裁判权，各国只空言同意，实际加以拒绝。1931年5月4日，国民政府虽然颁布了《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但外国人仍保留了一些特权；且《条约》的施行日期为1932年1月1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便不了了之。

国民政府“改订新约”的措施，恢复了一些中国长期丧失的主权，在关税自主和否认领事裁判权的合法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它顺应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是历史的进步。但这次“改订新约”又是很不彻底的，有很大的局限性，与中国人民关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贷款、“援助”、派遣顾问等方式，进一步攫取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权，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在继续加深。

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外交政策

“九·一八”事变，是由日军蓄意挑起的。这次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进而征服亚洲与称霸世界的狂妄计划中的一部分。

面对日本的挑衅和侵略，国民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星期，蒋介石就密令东北军：“遇有日军寻衅，

务须慎重避免冲突。”^①事变发生后，又严令东北军：“为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9月22日，蒋介石发表演说，公然主张“忍辱含愤”、“逆来顺受”。次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声称已“诉诸国联理事会，以待公理之解决”，不许中国人民起来抵抗。^②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致使10余万东北军不战自溃。日本侵略军在五天之内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吉林、奉天两省的各重要城镇，11月占领齐齐哈尔，翌年初占领哈尔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东三省全部沦于日寇之手。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义愤。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联合日本共产党中央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9月22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宣言，号召“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1932年4月26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对日战争通电：谴责国民党政府出卖中国、镇压反帝革命运动的罪行；指出只有工农民主政府才能真正领导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直接对日作战；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独立和解放。^③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各界人民纷纷举行游行、罢课、抵制日货等群众性斗争。东北人民和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共领导下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展开英勇顽强的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但是，国民政府却把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试图依靠英美阻止日本侵略中国。“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国民政府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理事会提出申诉，要求国联采取行动，“使危害和平的局势不致扩大”。^④9月22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中日双方停止一切冲突，撤退军队。9月24日，美国也对中日

① 转引自洪育沂《1931—1939年国际关系简史》，第6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9月20日。

③ 《苏维埃中国》第1集，第41—43页。

④ 洪育沂《1931—1939年国际关系简史》第11页。

两国发出内容相同的照会，要求双方都停止战斗行动。国联和列强从各自利益出发，采取所谓不偏不倚的态度，把被侵略的中国和侵略者日本放在同等的地位来看待，实际上起了掩盖日本侵略罪行和纵容日本侵略的作用。

在依赖国联的希望破灭后，蒋介石国民政府试图与日本直接交涉。1931年11月28日，国民政府希望新任外长顾维钧“布展其抱负，发挥其长才”，“俾我国外交，得以转败为胜，转危为安，庶不负政府与国民期望之殷也。”^①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反对，对日直接谈判未能实现。

1932年1月28日，日军悍然向上海发动进攻，并狂妄叫嚷“四小时占领上海”，“五个月占领中国”，日本进犯淞沪，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根基。因此，在十九路军奋起反击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推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一·二八”事变当天，国民党召开临时中政会，决定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并成立以蒋介石等为常委的军委会，统管全国军事。汪精卫当即提出了“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的方针。^②蒋介石也在1月29日手定了“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的方针。^③然而，蒋介石国民政府，并无心“积极抵抗”，只希望通过交涉，早日结束战事。因此，蒋介石通令“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④在中国军队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何应钦竟迭电上海市长吴铁城“商酌适可而止”，密令空军不得轰炸日本海军舰艇；蒋介石也“指示沪事”“趁此收手”。^⑤更有甚者，国

① 《外交为无形之战争》，《蒋总统集》第1集，第577页，1960年版。

② 转引自雷鸣《汪精卫先生传》第229页，政治月刊社出版。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431页。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出版。

④ 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文史资料选集》第37辑第12页。

⑤ 均参见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第38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民党海军部次长竟奉令同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同乘汽车，参观各处战壕，以维持两国海军的“友谊”。

上海是英美在华投资的重点城市。日本对上海的进攻也直接触犯了英美在华利益。因此，它们发表声明抗议日本的行动，增派海军舰只和海军陆战队，对日本施加压力。1932年2月26日，国联理事会向日本发出呼吁，要求它遵守国联盟约，不改变其他会员国的领土完整，不改变其政治独立。2月29日，国联建议中日两国代表会同其他国家代表在上海进行谈判。在国际压力之下，中日两国于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该协定不仅没有追究日本侵略罪责，反而规定了中国军队不得进驻日本撤出地区的条款。这完全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

上海停战协定一签订，蒋介石马上宣布把“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国民党处理内政外交的基本准则，叫嚷“国家大患不在倭寇，而在江西的‘土匪’”，^①“嗣后若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立斩无赦”。^②

1933年1月，就在蒋介石集中主力部队对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时，日军侵占了山海关并向热河进犯。3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128人不费一弹便占领承德，接着又先后进犯长城各要口及冀东等地。国民政府仍以妥协退让来达到求和目的。5月3日，国民政府明令设立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令，任命黄郛为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5月15日黄郛抵达北平，声称：“和外剿共，始为救时救党上策。”^③5月22日，黄郛与日方达成停战的原则性协议。25日，何应钦派军使往日军阵前求和，签订了停战“觉书”（即备忘录）。5月31日，中日双方代表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这个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侵占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

① 1933年4月7日，蒋介石在江西抚州的讲话。

② 1933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各将领的训话。

③ 转引自韬奋《由抵抗而失败了吗？》，《生活》周刊第8卷第21期。

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非武装区的设立，实际上敞开了华北大门，为以后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提供了方便。

三、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变化

国民政府的媚日外交并没有能够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就在国民政府热衷于对日亲善的同时，日本已将侵略的目光盯上了我国物产丰饶的华北地区，以政治外交和军事威胁为手段，有步骤地制造了一系列事件，统称“华北事变”。

1935年上半年，日本侵略者先后制造了“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并通过《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取得河北及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迫使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了华北。在华北的中国军队只剩下第29军。同年，9月24日，日本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公开声称，要“指导”华北五省的“自治”。^①10月4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11月，日本抛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向第29军军长宋哲元施加压力，并公开威胁道：“任何中国人欲以武力防范自治运动，必将触犯关东军的兵力。”11月24日，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自治政府”）。冀东22县大片国土脱离了中国政府。与此同时，日寇在“中日经济提携”的口号下，对华北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日本货物通过商品倾销和武装走私，垄断了华北的市场。华北的铁路、矿山、纺织等重要工业，大都为日本垄断资本所控制。

华北危急！平津危急！华北事变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日本在华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侵略扩张，不仅直接威胁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也扩大了日本同英美等国的矛盾，促使英美逐渐改变对日纵容的态度，开始支持国

^① 《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21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